

臺灣社會學刊，2009年6月  
第42期，頁189-198

評 論

# 世代如何浮現： 評蕭阿勤著《回歸現實》

2008，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李丁讚

李丁讚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dtlii@mx.nthu.edu.tw](mailto:dtlii@mx.nthu.edu.tw)）。

Ding-Tzann Li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anl Tsing-hua University.

蕭阿勤所著的《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以下簡稱《回歸現實》）從「世代」的角度切入來探索台灣七〇年代的政治文化變遷。根據蕭阿勤的分析，台灣在一九七〇年代有一股新的社會力量逐漸浮現，這股社會力量不是一般社會學所習慣指涉的階級、族群、性別、教育、區域等，而是「世代」。這個「世代」當然不是人口學上屬於同一個年齡層的「口合」，而是經歷時代創傷的覺醒才逐漸形成的「世代」。這不是一個自在的世代，而是實存的世代。蕭阿勤指出，這個新世代帶領台灣走出上一代的流亡心態，開始「回歸現實」，定睛在自己的土地、人民與歷史之上，進而開展出一系列的政治社會改革行動。因此，我們要瞭解台灣的七〇年代，以及之後的歷史發展，一定要從「世代」這個範疇切入，才能看清整個歷史的脈動，以及其中複雜的社會關係。

世代的概念是由Karl Mannheim最先提出，但之後一直沒有重大的發展。縱使在西方，世代的分析也都集中在年齡層的「口合」，而很少真正去處理實存的世代。蕭阿勤的研究，從台灣具體的經驗脈絡切入，透過敘事認同的分析，逐漸勾勒出實存世代的形成過程，以及從此引發的社會行動，讓我們對「世代」與「社會變遷」的辯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這不只對Mannheim的理論與概念進行了精彩的詮釋，也大大彌補了現存（包括西方在內）經驗研究的不足。我認為，這是台灣社會學的成就。而蕭阿勤之所以能完成這項成就，主要的原因是，他把敘事認同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在世代的分析，大大充實了Mannheim實存世代的觀念，也讓「世代」當成一個社會學範疇有了更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用「敘事認同」的理論來分析「世代」，細緻地釐清了「認同」、「敘事」、「時間」的內在關聯，也因而豐富了這個理論的內涵。

「敘事」是透過時間和情節的安排，將個人的生命故事置放在社會

和歷史的整體脈絡中，個人不但因此得以組織外在世界，進而認識世界。更透過這個關聯，把個人與社會和歷史連結起來。透過敘事，我們得以認同。「我們」是在敘事或記憶的重建過程中才逐漸浮現的。敘事與認同是一個相互建構的過程。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也是同樣的過程。蕭阿勤運用了敘事認同的理論，詳細地分析了三個世代單位，包括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鄉土文學、黨外運動的浮現與形成。從敘事認同的角度來看，這些分析都很精緻、嚴謹，也很有說服力地交代了這個世代是如何透過與過去歷史的連結，來定位自己當下的位置，以及未來的行動。這些分析當然都有其學術貢獻如上述，這也是敘事理論所擅長的地方。但是，這可能也是敘事理論的侷限所在。嚴格說來，《回歸現實》只解釋了三個世代單位的形成，而並沒有真正說明整個世代是如何浮現的。實存世代是眾多世代單位相互碰撞後才浮現而成，這可能不是敘事理論的「建構論」所可以單獨完成的。

集體意識，如階級、國族意識的「浮現」（emergence），除了需要「意識形態」上的論述與建構之外，也需要「物質」的鑲嵌與碰撞，才能交互編織而成為一個社會真實（Mann 1993）。這裡的「物質」包括身體的具體實踐與組織的運作等。世代意識是集體意識的一種，其浮現過程必然也同時包括物質與精神兩個面向的辯證，不只需要在「時間」軸上有故事、有框架、有想像，更需要在「空間」軸上，有社會關係的鑲嵌與互動。可是，《回歸現實》從敘事理論出發，強調時間面向的辯證，但輕忽空間與社會面向的連結；偏重「論述」，輕忽「行動」或「實踐」；偏重「敘事」而輕忽「儀式」；偏重「意識」，而輕忽「身體」；偏重「框架」，而輕忽「鑲嵌」；偏重「想像」，而輕忽「組織」與「運作」等。因此，在敘事理論的視角下，《回歸現實》對於空間／社會面向的輕忽是可以理解的。雖然，蕭阿勤一再強調，「敘

事」、「認同」、「行動」三者是相互構成的。但「行動」不是敘事理論的分析元素，因此，整本書我們只看到「敘事」與「認同」如何相互構成，「行動」卻好像只是敘事與認同產生之後的必然後果。

但是，行動往往是多種因素碰撞浮現而成。敘事理論單向、單元的解釋方式，簡化了七〇年代政治社會行動的原因，對於「實存世代」如何浮現的問題，也無法作有力的交代。因為理論框架的限制，蕭阿勤只能聚焦在歷史／精神／想像面向的處理，而忽略了社會實作的討論。因此，《回歸現實》在敘事理論內部的處理細緻而嚴謹，但這畢竟只是事實的一個面向而已。嘗試以此來解釋整個七〇年代世代意識的浮現問題，就難免以偏蓋全。這也是《回歸現實》的最大問題。因此，底下的討論，我嘗試把時間軸以外的東西也拉近來，把敘事認同放置在一個空間性的社會脈絡下來處理，讓敘事與實踐對話，讓意識與身體辯證，讓框架真正鑲嵌在社會脈絡裡，這樣或許對七〇年代的世代浮現，能有更動態、更全面的理解。而這個社會脈絡主要就是現代化的進程，以及與此相關的官僚理性化，也就是革新保台。新世代意識之所以能夠浮現，除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創傷所造成的意識覺醒之外，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諸多問題，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初步浮現等社會關係的改變，更是世代意識產生不可或缺的條件。

《回歸現實》所展現出來的史觀，其實有很相當濃厚的「斷裂」成分，七〇年代世代意識的誕生，八〇年代台灣意識的誕生，都呈現一種斷裂的狀態，雖然作者一再否認。其實，敘事理論偏重時間面向的討論，很難看到歷史與社會綿密交錯的動態連結，自然容易把歷史看成是由單一的事件所引發。如果把社會脈絡納進來討論，時空交錯的連續感自然應運而生，歷史的轉折也就不會那麼突兀了。以七〇年代的新世代意識為例，這固然主要是由當時的重大創傷事件所促成，但在這些創傷

事件之前，新世代雖然還沒有明顯的「意識」或「論述」，卻已經開始用「身體」在進行新的「實踐」了。世代意識的浮現，其實在創傷事件發生之前，就有脈絡可尋了，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突兀。尤其，創傷事件的發生之後，世代意識更必須鑲嵌在綿密的社會網絡中才能逐漸浮現，這更需要論述與實踐二者綿密的辯證。「歷史」本來就必須鑲嵌在「社會」中開展，何曾斷裂？

在七〇年代之前數年，新世代的青年們已經開使用他／她們的眼睛在觀看台灣的土地與人民，而不是等到七〇年代創傷事件之後才開始「回歸現實」。當時的社會氛圍是，現代化啓動已經有年，各種社會問題開始出現，傳統事物與人情逐漸消逝，因此，很多人帶著懷鄉的心情進入鄉村，嘗試捕捉即將失去的傳統。席德進在1967年到鄉下採集古厝、廟宇的傳統元素，啓動所謂「藝術歸鄉運動」。許常惠也下鄉採集民歌。黃春明、王貞和都開始寫鄉土小說，描寫鄉村的純樸和農人的古意。當時還出現「紀實攝影」，嘗試捕捉社會即將消逝或有問題的事物。《大學雜誌》也在1968年創刊，雖還沒有特別鮮明的社會批判意識，但眼睛卻對準當時的社會、土地與人民。「回歸現實」其實早在創傷啓蒙、意識覺醒之前就已經啓動，蕭阿勤雖然也提到這些事件，但這些無意識、非論述性、身體實踐性的事件對他是無意義的。他在論到八〇年代台灣意識的誕生時，七〇年代有關台灣的各種資料，至少還扮演「材料」的角色，對台灣意識的生產具有「起源」的意涵。但六〇年代末期這些「擬回歸鄉土」的所有事務，好像一點意義也沒有。

可是，從浮現的角度來看，這些「先行者」是重要的。誰敢說，蕭阿勤所引用七〇年代初期，諸多有關回到土地、人民、歷史的論述，只是單純受到創傷事件所啓蒙，絲毫沒有受到之前「擬回歸鄉土」的影響？也許是因為讀到黃春明小說中的鄉村，也許是看到紀實攝影的

感動，也許是受到《大學雜誌》寫實報導的影響等，是這些日常生活中，有意無意的碰撞，再加上創傷事件的啓迪，才逐漸浮現「回歸鄉土」的論述。我們最後所看到的論述框架，其實是在無數人與人、人與物、人與團體、或團體與團體的互動連結中才慢慢形成的。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每個人、事、物、甚至地點、時間等，都可能具有「動能」（agency），能牽引他者的改變。用這個角度來看，《回歸現實》把七〇年代的資料只是當成八〇年代的「材料」，也是過度簡化歷史。它雖然不是真正的actor，但卻是具有能動性的actant，是整個意識浮現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雖有跳躍，但卻總是連續的。這是因為我們把歷史放在社會的脈絡中來思考。

世代意識是一個緩慢的浮現過程。「回歸現實」這個論述，本身就是一個「意識」與「行動」不斷交織而成如上述。而這個「論述」能夠從少數人的腦海中，逐漸演變成整個（實存）世代的世代的、集體的意識，更是「組織、『實踐』」與「行動」等社會因素的綿密碰撞後才得以浮現。嚴格來說，《回歸現實》只進行了三個世代單位的分析，而沒有世代意識的分析。而縱使在世代單位的分析裡，也都只是一種「建構論」，而沒有去處理浮現的問題。以「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這個世代單位為例，促成這個世代單位形成的因素，絕不只是「某些世代成員」「有意識」去「建構」過去的「歷史」與「記憶」，就會逐漸形成「我們」的世代感。其實，這些成員的意識本身就是社會有意無意的行動與連結中才逐漸浮現的。「現代詩論戰」與「文季」本來就是很不一樣的團體，但透過高信疆、王拓的連結，「回歸現實」的具體圖像才逐漸清晰。而高信疆、王拓的作法，其實又是分別受到之前的各種碰撞所牽引促動而成。這是一個綿密的浮現過程，是人與人或團體在互動縫隙間（interstitial）所萌生，是一種相互「構成」，而不是主體「建構」。

如果說，世代單位是浮現的過程，整個世代意識更是不同世代單位所碰撞併生，而《回歸現實》並沒有真正去處理世代單位之間的互動，好像不同單位分別去建構，就能夠自動形成一個世代的集體意識。這明顯簡化了歷史。以黃煌雄的個案為例。蕭阿勤把黃煌雄看成只是「黨外運動」這個世代單位的一員，也因此無法進入綿密的社會過程的內部，來掌握意識的併生過程。其實，黃煌雄在從政之前，從來沒有和黨外進行接觸，他探索的歷史基本上都集中在二〇年代台灣，應該是屬於「日據台灣新文學」的世代單位。但後來與「黨外運動」接觸後，才嘗試把二〇年代的台灣歷史與戰後世代投身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作連結。這個連結不只改變了黃煌雄的歷史觀，也大大地加深了「黨外運動」的歷史縱深，讓黨外運動找到了紮根在這塊土地上的精神源頭，提升了「黨外運動」的能量。黃煌雄的例子讓我們看到不同世代單位之間如何互動連結，而世代意識其實是在世代單位的碰撞中，彼此相互影響所逐漸浮現而成的。這不是一種建構，而是構成。

但是，黃煌雄以及「日據台灣新文學」那個世代單位的成員，為什麼會談日據的歷史呢？從敘事理論的角度來看，這批人談日據歷史，完全是受到七〇年代初期創傷事件的啓蒙而開始的。從公開文本的證據來看也是如此。蕭阿勤也因此不承認「隱蔽文本」在這個分析裡的重要性。的確，從敘事理論來看，公開文本才有論述與認同的意義與功效。只是，如果從浮現理論的角度來看，隱蔽文本包括弱勢者彼此理解的謠言、小道消息、閒言碎語、偽飾託詞、反話、隱喻、儀式性的表情姿態等，其實對公開論述的形成，都可能扮演著形塑或連結的功能。康寧祥在1969年替黃信介助選時，就以「蔣渭水與台灣文化協會」為題，這幾乎是日據台灣史第一次進入公領域論述，也多少影響後續的發展。但是，康寧祥這個公開論述，其實受到他自己的生命傳記的影響。在私下



的日常生活中，他對日據台灣史非常熟悉，也因此才有能力把「隱蔽」化爲「公開」。行動與實踐往往在意識與論述之先。

嚴格說來，「黨外運動」這個世代單位與「日據台灣新文學」、「鄉土文學」這兩個世代單位是不一樣的。「日據台灣新文學」的成員們，的確把當時的台灣文學看成是中國文學、尤其是五四文學的發揚與展現，想像的框架是中國。「鄉土文學」的鄉土也是中國的想像。但是，「黨外運動」口頭上雖然還是以中國爲尊，政策上也多是族群平等的民主語彙，跟台灣國族沒有論述上的關聯。但是，「黨外運動」與其他兩個世代單位不同的是，它的歷史想像與框架是台灣，也就是日據台灣抗日史，而沒有特意要把這個台灣史與中國史或五四進行連結。換句話說，「黨外運動」的精神源頭是「台灣抗日」。歷史是起源的問題，也往往是國族意識的源頭。當抵抗國民黨慢慢與抵抗外族（日本）劃上等號時，台灣國族的意識也就隱約浮現了。這還不是意識上的建構，而是「日據台灣新文學」與「黨外運動」碰撞連結的必然結果。這個想像在經過1977到1978兩年，全省黨外助選團的串連與鑲嵌之後，逐漸具像化。這些都是後來八〇年代台灣意識的重要基礎。從浮現理論來看，這些歷史不只是材料，可能直接牽動台灣意識的浮現。歷史的發展比《回歸現實》所呈現的有更大的連續性，意識更有很多行動基礎。

因此，我們要探討世代意識的誕生，除了敘事理論的時間與建構的面向外，更要進入空間、社會、與浮現的探討，才能完整呈現世代意識的面貌。時間與敘事的軸線，其實是鑲嵌在社會的脈絡中開展的。這個社會脈絡最主要的就是現代化。六〇年代末，現代化各種問題開始引發注意，當時的年青世代也因此開始在行動上「回歸現實」。七〇年代的創傷事件，固然是啓蒙覺醒的關鍵，但蔣經國的革新保台政策，讓政治開始理性化，批判的聲音比較可以被聽見，人民的行動、結社有了比較



大的自由，學生社團，乃是人民團體有了初步的突破，甚至報章雜誌的尺度也顯著提升，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都有了初步的發展。這些都是現代性的一環，是瞭解那個年代的世代意識之所以能夠浮現的重要線索。只有我們進入社會脈絡與紋理之中，釐清人與人、人與物、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間的各種言論在公共領域、乃至私密領域中碰撞與連結，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併生與浮現，我們才更能全面地理解世代意識，以及歷史變遷的真實面貌。而這個面向正是《回歸現實》所相對欠缺的。

### 作者簡介

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研究民主文化與公民社會。

## 參考書目

Mann, Michael,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9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